

段祺瑞《正道居集》之感世宗旨探論*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引言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啟瑞，字芝泉，晚號正道居士、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民初國務總理、臨時執政，早年即與馮國璋(1859–1919)、王士珍(1861–1930)並稱為「北洋三傑」，為袁世凱(1859–1916)去世後的主要北洋領袖。早歲家貧，光緒十一年(1885)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習炮兵科。十五年(1889)春，獲李鴻章(1823–1901)青睞，選派到德國留學，先在柏林軍事學院(Prussian Military Academy)學習軍事理論，後轉往克虜伯炮廠(Krupp Arsenal)實習。甲午戰起，督率學生協守炮臺，抗擊日軍。是年底，清廷命袁世凱組辦新建陸軍，武器、編制、操練全用西法，為中國陸軍近代化之開端，亦標誌北洋系之肇始。段祺瑞擔任炮隊統帶、監督兼代理總教習，成為袁世凱的親信。二十七年(1901)，以三品知府銜任武衛右軍各學堂總辦。同年剿滅景廷賓(1861–1902)之亂，陞正二品候補道，加巴圖魯號，賞戴花翎。三十二年(1906)，接任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後擴建為保定軍官學堂)督辦。宣統二年(1910)，賞頭品頂戴，加侍郎銜，外放任江北提督。三年(1911)，任清軍第二軍軍統、湖廣總督。

民國元年(1912)初，帶領北洋將領四十六人通電，請清帝退位。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二年(1913)，一度代理國務總理，後署理湖北都督兼領河南都督。四年(1915)，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段以養病為由辭職。是年底，袁世凱謀畫稱帝，段不擁護。五年(1916)3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邀請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6月袁去世，黎元洪(1864–1928)接任大總統，與段祺瑞產生府院之

* 本文初稿分為兩部分，一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之「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15年6月4–5日)，一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一屆『從誤讀、流變、對話到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2015年6月12日)，分別得到特約講評人周興陸教授、施懿琳教授指正；復承諸位匿名評審者給予寶貴意見，使本論文修訂得較為完善。前此之資料蒐集，承蒙梁穎、陳嘉琳、李小妮、林彥廷諸君幫助，謹致謝悃。

爭，引發張勳（1854–1923）復辟，段氏組討逆軍平亂。此後馮國璋、徐世昌（1855–1939）繼任大總統，段氏皆為實際秉政者。九年（1920）直皖戰爭爆發，皖軍敗績，段祺瑞隱居天津，開始吃素念佛。十三年（1924），馮玉祥（1882–1948）發動北京政變，聯合張作霖（1875–1928）請段祺瑞擔任臨時政府執政。十五年（1926）春發生「三一八慘案」。4月9日段氏通電下野，再隱天津。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後，拒絕日本拉攏。兩年後應蔣介石（1887–1975）之邀移居上海。二十五年（1936）在上海病逝，享壽七十二。段祺瑞出身行伍，然有一定文史修養，晚年尤好創作詩文，先後結為正道居諸集。章士釗（1881–1973）為收錄段祺瑞散文的《正道居感世集》作序，論云：「惟公偶操柔翰，雅善名理，每有述作，伸紙輒千數百言。以釗少解文墨，屬令洗伐。釗亦以此道非公所長，意存獻可，而反覆視之，轉無以易。造意初若不屬，細審其脈自在。選詞初若生硬，實乃樸茂，非俗手所能。」¹復如徐一士（1890–1971）論其詩文云：「文學非所長，然頗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別饒意致者。」²其後《正道居感世集》正續集、《正道居詩》正續集合編為《正道居集》。

如段祺瑞〈自序〉所言，《正道居集》所收詩文皆「有關世道人心者」。段氏且希望此書一出，「庶幾聖經賢傳，精意煥發，奠安海內，極於四遠，冶世界於一鑪，咸沐大同之化云爾」。³進而言之，段祺瑞編定《正道居集》的標準，至少有二端：（一）諸通電、公文並非段氏所作，不予納入；（二）如〈友梅姻丈絕筆詩惻隱憂傷次韻奉挽〉、〈陸軍上將遠威將軍徐君神道碑〉，或講述亡者之生平業績，或表達作者之哀感，與《正道居集》其他篇章旨意有所不同。尤有進者，《正道居集》雖無「感世」字樣，但「感世」之旨仍一以貫之。先觀《感世集》所收五文，〈聖賢英雄異同論〉以史論為主，借古喻今。〈內感〉、〈外感〉二篇論述清末民初之內政、外交，〈靈學要誌序〉、〈靈學特刊序〉則對中國傳統之宗教推崇備至。前三篇更被段氏視為得意之作，觀其〈賦答修慧長老〉詩可知：「宣揚大同化，竭力聖功傳。聖賢英雄論，兩感內外篇。」⁴《正道居集》文卷增入三篇，〈儒釋異同論〉進一步闡發傳統宗教之殊勝處。〈產猴記〉先言家中所養兩猴之癡迷，歸結出「愛之不以道而殺之，雖愛奚益」之理，以勸誠世人克己接物。〈因雪記〉雖云「啟發兒曹之文思」，然對於國事陵夷的現狀亦有「曲致虔誠，默禱上蒼」的祈願。至於詩歌部分，如〈賦答修慧長老〉、〈孔道〉、〈達觀〉、〈十勵篇〉、〈八箴〉、〈正道詠〉、〈讀孔子閒居篇書後〉等，皆鼓吹儒釋二道之作。〈砥世詠〉二首、〈末世哀〉、〈時局幻化感〉、〈閔世〉、〈持正義〉、〈觀世篇〉、〈醒世〉等，皆感懷時局之作。他如〈先賢詠〉吟詠李鴻章，〈藤村子爵索書口占即贈〉贈日本友人，〈弱弟哀〉悼念亡弟，〈旅大游〉紀錄遊觀，〈詠雪二首次某君韻〉吟詠冬

¹ 章士釗：〈序〉，載段祺瑞：《正道居感世集》（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刊本），頁一下至二上。

² 徐一士（著）、徐禾（選編）：《亦佳廬小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78。

³ 段祺瑞：《正道居集》（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刊本），〈自序〉，頁二上至二下。

⁴ 同上注，詩卷，頁一下。

雪，〈和伯行韻〉乃和李經方（1855–1934）弈棋之作，不一而足。然整體而言，詩作主題皆以「天下大事」為依歸。各篇之中，段氏作為民國大老、國家元首的意識非常強烈。即便如〈弱弟哀〉之自悲，或其他詩作之酬唱，對象讀者亦非僅其個人或二三友朋，而是全國民眾。兼以段氏本身嚴肅刻板，不苟言笑，故詩文集中幾乎沒有吟風賞月的作品。筆者以為，「感世」即所謂「有關世道人心」，其「感」可由「感懷」及「感化」兩個主題呈現。「感懷」乃客觀世界對於個人心靈的根觸，包括歷史感慨與時局憂感；「感化」則為個人思想對於群眾意識的影響，包括民生教化與國是建白。下文擬先綜論正道居諸集之版本，然後依次論述《正道居集》所收詩文之「感懷」及「感化」主題，以見其感世宗旨。

段祺瑞正道居諸集版本綜論

段祺瑞《正道居集·自序》云：「溯余髫齡就傅，歷十餘載，探討聖賢之精蘊，誠欲有所建白，不負先人期許而光大之也。」⁵黃征等指出，就讀私塾對段氏一生影響甚大，年幼即對儒家經書有一初步了解。⁶進而言之，段氏此時也必然受到舊體詩文寫作的訓練。其後段祺瑞投筆從戎，光緒十一年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先學習兵法、地利、軍器、炮臺、算法、測繪等課程。復如黃征等所云，清王朝為了鞏固統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是不可逾越的原則。熟讀經史，以感發忠義之心，仍是該學堂的根本宗旨。故每日熟讀並背誦經史一段，依舊是段祺瑞等人的必修課，這也為後來段祺瑞的「文治」打下牢固基礎。⁷由於他兼通軍政、文義，其後能在芸芸將帥中脫穎而出，可想而知。彭秀良指出，徐樹錚（1880–1925）民國十四年（1925）的〈上段執政書〉提到為已經去世的林紓（1852–1924）、姚永概（1866–1923）請飭存恤，又為柯劭忞（1850–1933）、王樹枏（1851–1936）、馬其昶（1855–1930）、胡玉縉（1859–1940）、陳漢章（1864–1938）、賈恩紱（1865–1948）等名宿請求厚贈祿養。此書不但是對段的請求，也是對段多年敬重名士宿儒的一個回顧。⁸段祺瑞作為袁世凱門生，清末編練新軍的不少重要文字如《編練章制》、《戰法操典》、《訓練操法詳晰略說》等，「半由其手訂」。⁹然目前所見其名下之著作，僅有正道居諸集而已。

段氏《正道居集·自序》云：「癸亥歲五易之元首，選非其道，浙遼軍興，國無政府，……海內環請，未忍膜視，遂就臨時執政。適遊士風靡，侈談新奇，人心澆漓，將無底止。念非孔孟之道不足以挽頹風，欲述斯旨，難已於言。凡有關世道人

⁵ 同上注，〈自序〉，頁一上。

⁶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

⁷ 同上注，頁5–6。

⁸ 彭秀良：《段祺瑞傳》（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42–43。

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26。

心者，漸積成帙。友好堅促，一再刊行。」¹⁰段祺瑞早年戎馬倥傯，無暇文事，民國以後於政壇數度起落，年齒既長，亦漸多感慨，故其詩文多為晚年所作。今人李慶東指出，段祺瑞東山再起擔任臨時執政（1924–1926），軍國大事自有張作霖、馮玉祥等人代為操辦，因此每逢失意閒暇之時，便賦詩作文，代聖賢立言，乘機超脫一下，故寫於這一時期的作品保留下來的最多。¹¹如〈聖賢英雄異同論〉、〈內感篇〉等作於執政任上，先結為《正道居感世集》。民國十五年下野後，復居天津，作詩更為頻繁。此外，段氏外孫女袁迪新云：「每天早上起來，外公頭件事便是念經誦佛，待吃過早飯，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過來，幫他整理編選歷年來的詩文，準備刊印一部《正道居集》。」¹²而王符武回憶，一起披閱舊時詩文、協助刪定者還有王覺三。¹³兼以〈自序〉有「一再刊行」字樣，可知《正道居集》在段祺瑞自臨時執政下野之後仍有編輯。今人胡曉《段祺瑞年譜》則於十八年（1929）下紀錄：「居天津日租界須磨街。與王揖唐討論《正道居集》。」¹⁴二十二年（1933），段祺瑞南下上海，則《正道居集》之最後編定刊印，當在此四年間。

上海圖書館所藏正道居諸集，共有四種：《正道居感世集》、《正道居詩》、《正道居詩續集》及《正道居集》。《感世集》收錄〈聖賢英雄異同論〉、〈內感篇〉、〈外感篇〉、〈靈學要誌序〉、〈靈學特刊序〉五文，前有章士釗序，落款為十五年二月。名為《感世集》，蓋因書中有〈內感〉、〈外感〉兩篇。而〈內感篇〉更於十四年3月24日刊登於《政府公報》。「內感」是對國內時局的感想，「外感」是對國際時局的感想。¹⁵〈內感篇〉論內政，〈外感篇〉論外交，反映了段祺瑞施政的核心思想。¹⁶

¹⁰ 段祺瑞：《正道居集》，〈自序〉，頁二上。

¹¹ 李慶東：《段祺瑞幕府與幕僚》（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頁37。

¹² 《環球人物》雜誌（編）：《往事如煙：民國政要後代回憶實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0。

¹³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頁305。

¹⁴ 胡曉（編著）：《段祺瑞年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53。

¹⁵ 見魯迅《馬上市日記·豫序》註，載《華蓋集續編》，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3卷，頁289。

¹⁶ 大連圖書館藏有《聖賢英雄異同論》不分卷，民國十五年鉛印本一冊，題「段勳業撰」，其出版年份與上海圖書館《感世集》之章序落款相合。又網上谷歌圖書（Google Books）資料所見，有章士釗《聖賢英雄異同論》，所藏何處未詳。觀上海圖書館《感世集》，扉頁及各文題下並無段祺瑞之署名；而章序云「合肥段公勳業炳然一時」，此蓋大連圖書館誤以「段勳業」為著者姓名。谷歌圖書將著者題作章士釗，則有兩種可能：（一）因著者於書中未有署名，遂誤以序者為著者；（二）段氏此文先登於章士釗主編《甲寅周刊》第1卷第26期，章氏以筆名孤桐下按語曰：「右為執政徵文命題，內行校閱各卷，忽饒興趣，爰擬斯篇，以示多士。孤桐謹識附。」而其目錄又不標著者姓名，後人遂可能誤以此文為章氏所為，《章士釗全集》亦予收入。進而言之，大連所藏及谷歌所見《聖賢英雄異同論》之相關資料皆涉及章士釗，可見此單行本亦有章序在前。然上海圖書館《感世集》章序已云：「本集所收文特五篇耳。」若單行本猶以章文為序，則前後所言不符。

〈聖賢英雄異同論〉一文，《甲寅周刊》作〈聖賢與英雄異同論〉。除此文外，段祺瑞尚有多篇作品登載於此刊。¹⁷《甲寅周刊》既是章士釗在段祺瑞授意或默許下創辦的，故持正道居諸集比觀，段祺瑞與甲寅派在思想政見上非常契合。茲將段氏刊登於《甲寅周刊》之作品表列如下：

表一

	篇名	編號及日期	備註
1	二感篇	18期，民14.11.14	正道居諸集分為〈內感篇〉及〈外感篇〉
2	聖賢與英雄異同論	26期，民15.01.09	單行本及正道居諸集作〈聖賢英雄異同論〉
3	產猴記	31期，民15.02.27	
4	因雪記	33期，民15.03.13	
5	和蘇蕙	38期，民16.01.01	正道居諸集不收
6	有感次範孫和王仁安均	40期，民16.01.15	正道居諸集不收
7	覺迷吟	43期，民16.02.19	
8	弱弟哀	45期，民16.03.05	

除〈聖賢與英雄異同論〉未有署名外，〈二感篇〉、〈產猴記〉及〈因雪記〉題段祺瑞本名，詩篇則題「正道」。誠如《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所言，此刊共登「特載」八篇，包括章士釗的一封電報、三篇呈文和段祺瑞四篇文章。段氏四篇詩作則刊登於「詩錄」部分。¹⁸茲將目前所知其他刊物所載段氏詩文聯語表列如下：

¹⁷ 民國十四年，章士釗任段祺瑞執政府教育總長，於7月18日在北京出版《甲寅周刊》，至十六年(1927)3月停刊，前後共出四十五期。該刊早期曾刊登反袁文章，其後在文化上宣揚尊孔讀經，主張保存國粹，反對新文化運動；經濟上主張農工並重，側重農業發展；政治上反對國民黨黨治，主張民權。《甲寅周刊》作者群因政見相似，被稱為「甲寅派」。《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指出：「該刊刊登了不少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執政段祺瑞的文章，段祺瑞命題的徵文，章士釗向段祺瑞的呈文，反映段祺瑞政府意旨的『時評』。章士釗的文字每期都占相當多的篇幅，因此，該刊被人們稱之為『廣告性的半官報』。」見唐沅等(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719。

¹⁸ 〈聖賢與英雄異同論〉也是段祺瑞的徵文命題之一。郭雙林云：「第二次有獎特別徵文從1925年10月3日開始，題目為〈聖賢與英雄異同論〉，由段祺瑞擬定，獎金也由段捐出三千元廉俸支付，到10月底齊稿。根據第一次徵文啟事，凡獲獎的文章都將在《甲寅周刊》上刊載。事實上，兩次徵文，入選文章達一百一十六篇，而在《甲寅周刊》上公開刊登的僅三篇，即潘大道的〈代議不易辨〉、文天倪的〈科道制與代議制之利害得失如何立法與彈劾二〉(下轉頁215)

表二

	篇名	期刊、編號及年份	備註
1	祝詞	《華僑雜誌》1期，民2	正道居諸集不收
2	內感篇	《政府公報》3400期，民14	
3	內感篇	《晉民快覽》民14年4期	
4	外感篇	同上，民15(五周年紀念號)	
5	挽孫中山先生聯	《喚群特刊》民15年3期	正道居諸集不收
6	中秋節日作十首	《遼東詩壇》16期，民15	正道居諸集不收
7	奉贈清浦子爵	同上18期，民15	正道居諸集不收
8	詠雪二律	同上23期，民16	
9	策國篇	同上24期，民16	
10	賦答修慧長老	同上26期，民16	
11	旅大游	同上27期，民16	
12	旅大游	《國聞周報》4卷31期，民16	
13	伯型枉詩次答	同上4卷29期，民16	正道居諸集不收
14	大廈詠	《民視日報》民17(七周年紀念彙刊)	正道居諸集不收
15	贈徐專使李恩兩副使序	《來復》90期，民18	正道居諸集不收
16	禮義廉恥立	《遼東詩壇》68期，民20	正道居諸集不收
17	病中吟	《興華》30卷12期，民22	正道居諸集不收
18	讀孔子閒居篇書後	《詩經》1卷6期，民25	
19	題詞	《安徽旅鄂同鄉會第一屆會務彙刊》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20	楹聯	同上	正道居諸集不收
21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後序	《佛學半月刊》123期，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22	菩提學會迎請覺拔上師函	同上127期，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23	菩提學會初迎能海大師來滬講經函	同上127期，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24	菩提學會再迎能海大師來滬講經函	同上127期，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25	八勿	《教育生活》4卷4期，民25	正道居諸集不收

上海圖書館所藏《正道居詩》僅錄〈賦答修慧長老〉、〈砭世詠〉一、二，合計三首。《詩續集》則有〈策國篇〉、〈孔道鳴〉、〈弱弟哀〉、〈藤村子爵索書口占即贈〉、〈覺迷吟〉、〈末世哀〉、〈旅大游〉、〈懷舊〉、〈閔時〉、〈達觀〉、〈十勵篇〉、〈八箴〉、〈贈度青〉、〈和均眳孫逸塘〉、〈詠雪二首次某君韻〉，合計十五題三十二首。

此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正道居感世集》四冊，著錄為「一卷，詩二卷，續集一卷」。實則每冊一卷，第一卷為《感世集》，第三、四卷分別為《正道居詩》及《詩續集》。第二卷亦即所謂「續集一卷」，書名為《正道居感世續集》，收錄〈儒釋異同論〉、〈產猴記〉、〈因雪記〉三文。《感世續集》乃上海圖書館所未藏者。進而言之，《感世》正續集及《正道居詩》所收作品篇幅較長，故每篇頁碼皆獨立編排；唯《詩續集》諸篇則統一序次頁碼。

至於上海、北京諸圖書館所藏《正道居集》，係《感世集》、《感世續集》、《正道居詩》及《詩續集》之合訂本。全書前有段祺瑞自序，次為目次，分「文目」、「詩目」，正文亦編為「文」、「詩」兩卷。兩卷首頁首行皆僅標「正道居集」四字而無文、詩字樣，次行標「合肥段祺瑞」，頁碼則兩卷分別編排。文卷所收諸篇仍依《感世》正續集之編排次序。詩卷依次全收《正道居詩》及《詩續集》諸篇，又增入十八首。¹⁹換言之，《正道居集》共收文八篇，詩三十三題五十首，乃目前內容最為齊備者。本文所論，亦以《正道居集》為中心。

如表一及表二所見，現存民初期刊中尚有不少段祺瑞佚詩佚文，如《甲寅周刊》之〈和蘇戡〉、〈有感次範孫和王仁安均〉，《遼東詩壇》之〈中秋節日作十首〉、〈禮義廉恥立〉，《民視日報》之〈大廈詠〉，《興華》之〈病中吟〉，《國聞周報》之〈伯型枉詩次答〉，《來復》之〈贈徐專使李恩兩副使序〉，《佛學半月刊》之〈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後序〉、〈菩提學會迎請覺拔上師函〉、〈菩提學會初迎能海大師來滬講經函〉、〈菩提學會再迎能海大師來滬講經函〉等皆是。又如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一書中有段祺瑞序

〔上接頁213〕

權之分合利弊安在此項條文應如何規定其各分別論之)和唐蘭的〈聖賢與英雄異同論〉，分別為第一次有獎徵文的第一、二名和第二次有獎徵文的第一名。由此可見徵文效果，至少在章士釗看來不怎麼樣。」見郭雙林：〈論《甲寅》雜誌與「甲寅派」〉，載本書編輯委員會(編)：《近代文化研究的繼承與創新：龔書鐸教授八秩初度紀念》(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58-59。而錢仲聯云：「嘉興唐蘭庵(蘭)，……曾作〈聖賢英雄異同論〉，應《甲寅周刊》之徵。段芝老見之，大激賞，疇以四百金。金脫手豪遊，數日而盡，已而敝車羸馬，泊如也。其落拓自喜如此。」見錢仲聯：《夢苕庵詩話》(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81-82。唐蘭一文刊登於第31期。

¹⁹ 計有〈和伯行韻〉、〈可憐吟〉、〈時局幻化感〉、〈伯行枉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次韻奉答〉、〈閔世〉、〈持正義〉、〈懺占〉、〈饒舌僧〉、〈正道詠〉、〈觀世篇〉、〈醒世〉、〈王采丞和余正道詠次答〉、〈先賢詠〉、〈砭世詠〉三、〈往事吟〉、〈錯認我〉、〈除夕偶成和某君韻〉、〈讀孔子閒居篇書後〉。

文，亦不見於正道居諸集。²⁰此外，段氏佚詩亦偶存於遺墨中，如〈友梅姻丈絕筆詩惻隱憂傷次韻奉挽〉，²¹此蓋亦刪削之一例。復如民國二十三年(1934)夏，段祺瑞應蔣介石之邀移居上海已屆一年，因胃出血而在蔣介石安排下到廬山避暑，接受《大公報》記者王芸生採訪。他說覆函中寫了一詩，尚能記憶：「憂樂與好惡，願盡與民同。三章法定漢，民足國不窮。興邦用順守，世民竟全功。提倡興百業，四海揚仁風。」²²今人殷文波有〈段祺瑞覆蔣介石信〉一文，謂其祖父殷樹森為老同盟會員，教其抄寫此信於《聽潮軒書齋尺牘抄本》之〈名人尺牘之部〉。原尺牘已不存，然殷文波猶能背誦原文。²³其信云：「兄曾讀孔氏之書，忠恕接物，富貴浮雲，此亦海內所共知者。古有名〔明〕訓：『民為〔惟〕邦本，本固邦寧。』爾稱主義既在民，際此民不堪命，希三致意焉。」與「提倡興百業，四海揚仁風」之旨意正合，此詩當即該覆函所附者，而其作固在《正道居集》刊行之後。

其次，由於身居要職，段祺瑞名下的通電、公文為數甚多，而文字不少皆出自徐樹錚之手。光緒二十八年(1903)，徐樹錚懷揣自撰《國事條陳》求見山東巡撫袁世凱。袁氏看罷以為見解不凡，遂指派山東督練公所總辦段祺瑞接洽考察。段祺瑞對徐樹錚極為賞識，一見如故，從此視為入室弟子，文案公牘皆交其主辦。如民國元年初，身為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的段祺瑞，聯合四十六名北洋軍官，兩度領銜向清廷發出請願共和的通電，贏得「一造共和」之名，而通電即為徐樹錚手筆。此後如十三年起臨時執政諸令亦然。十四年12月30日，徐樹錚遭馮玉祥遣人暗殺。段祺瑞得聞噩耗，乃為徐樹錚購置棺木，親撰〈陸軍上將遠威將軍徐君神道碑〉。又十六年(1927)，北伐如火如荼，段祺瑞於9月17日致函蔣介石，敦促其保護袁世凱遺產。²⁴這些文字皆不見於《正道居感世集》，亦未錄入最後編定之《正道居集》。

由於《正道居集》刊印不久，段祺瑞即南遷上海。其後抗戰爆發，國難方殷，故流傳極為有限。目前僅上圖、北圖等寥寥幾處皮藏，鮮為人知。世人對《正道居集》所錄篇章之認知，大抵來自《一士類稿》。該書有〈談段祺瑞〉一篇，作於段氏初逝之際，錄有〈因雪記〉、〈先賢詠〉、〈和伯行〉、〈詠雪二首次某君韻〉其一、〈伯行枉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次韻奉答〉及〈策國篇〉，前一為文，後五為詩。錢仲聯編《清詩紀事》，亦將該五詩逐錄，因故流傳較廣。此外，集中〈持正義〉一詩，亦見於曹汝霖(1877–1966)《一生之回憶》，文字略有差異，可資校勘。若非曹氏紀錄，今人僅憑《正道居集》，固難知此詩乃段祺瑞贈曹汝霖之作。劉春子、殷向飛所編《段祺瑞：三造共和的籠中虎》一書，除選錄〈因雪記〉、〈先賢詠〉、〈伯行枉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

²⁰ 此筆資料蒙國立成功大學林彥廷先生告知。

²¹ 李慶東：《段祺瑞幕府與幕僚》，頁73。

²² 賀偉：〈民國要員與廬山〉，《檔案天地》2007年第1期，頁15。

²³ 殷文波：〈段祺瑞覆蔣介石信〉，《合肥文史資料》第14輯(1996年)，頁75–76。

²⁴ 張愛平：〈段祺瑞給蔣介石的一封信〉，《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1期，頁72。

次韻奉答》、〈策國篇〉、〈內感篇〉、〈聖賢英雄異同論〉、〈外感篇〉、〈產猴記〉諸詩文外，且錄有〈為保護袁世凱遺產致蔣介石手札〉、〈挽孫中山聯〉、〈遺言〉三篇。²⁵

正道居詩文的感懷主題

正道居詩文的創作，大抵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此時段祺瑞不再任名義元首（臨時執政），故富於寫作閒暇。段祺瑞熟諳古史，每有評騭，對於晚清民初史則更因親身經歷而多所議論、興慨。抑有進者，民初以來憂患相尋，故正道居詩文對於時局的憂感，又往往可回溯到民初史事。本節對於感懷主題之討論，即從歷史感慨及時局憂感兩方面開展。

歷史感慨

段祺瑞歷史知識甚為豐富，如〈聖賢英雄異同論〉便有段落自三皇五帝至元代的歷史作了一番通盤評論。論元代之興曰：

元太祖成吉思汗起於漠北，強弓怒馬，衝突無前，我外無人，盡死不惜。宋敝於金，而金亦力竭。收漁人之利，進據中原，長驅而南，至於印度之鐵欄關。納角端之忠告，即日班師，西滅國四十，洪波蕩漾於俄境，英雄之稱，赫耀全球。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幸有耶律楚材、廉希憲、劉秉忠三賢宰相，學識超邁，尤為罕見。補苴罅漏，苟安八十餘年。一經挫敗，風捲敗葉，掃蕩無餘。一國之英雄如是，一鎮一隅之英雄更可知矣。武功之結果，可為後世之殷鑑。²⁶

段氏認為，英雄如成吉思汗，若不行聖賢之道，在歷史上也只是過眼雲煙。如此論述，顯然是勸戒民初割據四方的軍閥，勿以英雄自居而殘暴不仁。此外，正道居詩文中也不時引用相關典故，如〈內感篇〉云：「唐虞之民，鼓腹而歌，帝力何有！桀紂之世，時日曷喪，民願偕亡。」²⁷不僅簡單扼要地描繪出堯舜、桀紂時代的社會面貌，且暗引《帝王世紀》及《尚書》文字。²⁸又如〈達觀〉篇：「據國不納父，蒯瞶被子

²⁵ 劉春子、殷向飛（選編）：《段祺瑞：三造共和的籠中虎》（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為保護袁世凱遺產致蔣介石手札〉即民國十六年9月17日信，錄入張愛平文章者。

²⁶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六上至六下。

²⁷ 同上注，頁八下。

²⁸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哉！」《尚書·湯誓》云：「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1981年），頁180。

篡。謀蓋都君績，欣欣喜自獻。共叔請大邑，鄭莊任滋蔓。黃泉誓見母，梟獍無少間。」²⁹歷數蒯聵、象(都君)、鄭莊公等不孝不悌的掌故，不一而足。

段祺瑞在清末出仕，故筆下不時會回顧該段歷史。無論回顧古史還是近代史，都有鑑古知今之意。如〈先賢詠〉即以長篇五古的體式評述了晚清重臣、合肥先賢李鴻章的一生事業，從李氏早年入曾國藩(1811–1872)幕，征粵匪、討捻軍、甲午海戰、庚子賠款，以敘事為經、議論為緯，全面評述了這位鄉先賢的一生事蹟，流露出推崇之情。而其〈往事吟〉亦云：「文學諸大老，唱和韻矜奇。自命為清流，濁者究是誰？……殊知徒專橫，內外相乖離。購艦三千萬，林園供虛糜。……北洋敵日本，合肥一肩仔。其他廿二省，何嘗有所資？」³⁰對於甲午戰爭前夕，自命清流的翁同龢(1830–1904)等閣臣、挪用北洋軍費建造頤和園的西太后(1835–1908)、以及其他作壁上觀、置身事外的封疆大吏皆有批評。後文又齒及庚子之亂：

庚子復仇教，八國決雄雌。親貴嘉其義，強悍猛熊羆。
三數賢輔佐，致身肝膽披。誇大僅一觸，隨即撤殿帷。
責難嚴且厲，國幾不堪支。舊都還須臾，氣概復弛弛。³¹

在段祺瑞看來，義和團盲目仇視洋教，已有失偏激；端王載漪(1856–1922)乃至西太后等竟惑於團民神功之說，更是不可思議。八國聯軍的殺傷力被人誇大，而西太后卻信其言，隨即西逃。故列強在談判桌上咄咄逼人，庚子賠款使中國利益大受損失。但兩宮還都後，滿清權貴依然洋洋自得。國事之不可為，由是可見。對於故主西太后，段祺瑞在詩中盡量避免指名道姓，然對於其施政之不滿，則溢於言表。

其次，有些篇章在談及清末歷史時，還結合了段氏的自身經歷。如光緒九年(1883)，清軍決定在旅順口修築海岸炮臺十二座、陸地炮臺九座，安裝大炮八十尊，時在北洋武備學堂學炮工的段祺瑞奉派到旅順修炮臺。³²四十四年後的民國十六年4月至9月間，段祺瑞故地重遊，到大連居住了一段時間，寫下〈旅大游〉與〈懷舊〉兩篇詩作。〈旅大游〉云：

重來四十年，不禁悲與傷。子徵鎮金州，薊林旅順王。
魯卿繼其後，毅軍屯其旁。甲午一戰後，相率去不遑。
旅大俄所租，專橫恃力強。比鄰偏鬥狠，促之走徬徨。
不及十年間，幾度荊棘場。白骨塚如山，表彰有一坊。
當時豪傑士，已盡還北邙。榮華浮雲去，大夢若黃梁。³³

²⁹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十上。

³⁰ 同上注，頁二三下至二四上。

³¹ 同上注，頁二四上。

³² 吳廷燮：《段祺瑞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9。

³³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七下。

「子徵鎮金州，薊林旅順王」兩句下雙行小註曰：「當時有此語。」子徵即劉盛休（1840–1916），為段祺瑞同鄉前輩、淮軍將領，劉銘傳（1836–1896）之族姪。劉銘傳辭職歸里後，劉盛休接統銘軍二萬餘眾。光緒中葉，率銘軍駐防金州（大連），補授南陽鎮總兵，籌修戰守設施。段祺瑞修築炮臺，正是因應劉盛休的要求。薊林即劉含芳，安徽省貴池人，通曉法文，為李鴻章得力助手。光緒七年（1881）起奉李鴻章之命駐守旅順十一年，把旅順建成了北洋海軍重鎮，功績顯著。龔照璦（1840–1901），亦合肥人，光緒十六年（1890）經李鴻章推薦，總辦旅順船塢工程。甲午戰爭中，龔氏聞知金州失守，乘海軍廣濟輪逃往煙臺。次年為清廷判處死刑，後未執行。其後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撤離，金州、旅順為沙俄租借，號稱達里尼市（Дальний，遙遠之意）。日俄戰後又為日本占領，改達里尼為大連，至抗戰勝利後方才歸還。段氏此詩前半以敘述為主，即便寫龔照璦之潰敗，也只是「相率去不遑」一句，又旁帶「毅軍屯其傍」，以映襯龔氏的不戰而走，頗有冷峻之感。而全篇最後四句，雖富於對劉盛休、劉含芳的業已物化、世事滄桑的感慨，卻隱含著旅大已非中國所有的惋惜。至於〈懷舊〉一篇，則進一步描述了日治之下旅大的面貌：

大連設國防，柳樹屯居中。不才曾承乏，要塞分西東。
回首四十年，光景大不同。俄強租旅大，日勝執為功。
海壩仍俄舊，大興土木工。商業萃西岸，萬國梯航通。
向罕人迹到，今多百家叢。君子求諸己，自問須返躬。
旅順儲軍備，糾糾氣尚充。惜哉人我見，幻化豈云終。³⁴

日本自沙俄手中接管旅大後，參照俄國原來的規劃圖進一步建設，不僅人口稠密、商業繁榮，軍備也充實。持日人管制的旅大與當時中國內地相比，差距甚大。故「君子求諸己，自問須返躬」兩句，意謂國人雖然痛恨日本，卻不能不捫心自問，有沒有如日人般團結一致、發憤圖強？然而今人張鳴論道：「最根本的問題是，自打二十一條之後，中日兩國之間國民的基本信任已經蕩然無存，……二十一條對中國人，尤其是對知識界的刺激實在是太大了，早已風聲鶴唳，任何中日間的交易，都可以向喪失權益的方向解讀。當然，以當時國人的慘痛經驗而言，這樣的解讀，也未必沒有道理。」³⁵因此，此篇篇末「惜哉人我見，幻化豈云終」兩句，感慨良深。此見已成，要國人以敵為師，談何容易！此詩標題雖是對往事的感懷，卻也表達了對時局的態度。

此外，段祺瑞對自己當年主政時的措施也有追憶，如其贈給曹汝霖的〈持正義〉詩，著力評述了自己對西原借款的態度。西原借款是民國六至七年（1917–1918）間段

³⁴ 同上注，頁八上。

³⁵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58。

祺瑞政府和日本寺內正毅(1852–1919)內閣所簽訂連串借款的總稱，因日方經手西原龜三(1873–1954)而得名。寺內鑑於前任大隈重信(1838–1922)內閣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不成，決定調整對華政策，採取懷柔方式，停止支持南方革命黨人，增加對北洋政府的經濟援助，以擴大其在華利益。經曹汝霖、陸宗輿(1876–1941)、章宗祥(1879–1962)三人承辦，以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為抵押，前後獲得貸款1.45億日元。今人許毅、趙雲旗認為，「西原借款」是段祺瑞政府為了封建獨裁，而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一筆骯髒的政治交易。³⁶然段氏〈持正義〉詩辯解道：

不佞持正義，十稔政潮裏。立意張四維，一往前如矢。
側目忌憚者，無詞可比擬。謂左右不善，信口相詬訾。
唱和聲嘈雜，一世胥風靡。賣國曹陸章，何嘗究所以？
章我素遠隔，何故謗未弭。三君曾同學，宮商聯角徵。
休怪殃池魚，只因城門燬。歐戰我積弱，比隣恰染指。
強哉陸不撓，樽俎費脣齒。撤回第五件，智力已足使。
曹迭掌度支，譎言騰惹苴。貸債乃通例，胡不諒人只？
款皆十足交，絲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誣蔑仍復爾。
忠恕固難喻，甘以非為是。數雖百兆零，案可考終始。
參戰所收回，奚啻十倍蓰。³⁷

西原龜三畢生以「王道主義者」自居，認為作為東亞民族精髓的王道，即和合一致，王道的現代化、經濟化是協同協力的精神、發揚與實現，³⁸故願效力寺內內閣，為借款事宜奔走。據顧維鈞(1888–1985)回憶，當年發行外債，中國政府的實收均不到九成。³⁹然日本借款卻因寺內的懷柔政策及西原的王道主義理念而實足交付、滾滾西來，故段氏稱許為「款皆十足交」、「列邦所希有」、「忠恕固難喻」，其因在此。至於段氏試圖以西原借款達成其武力統一的理念，誠如馮學榮所言，以孫、段為代表的南北雙方都各自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中華民國正統」，而且都想武力統一全中國。⁴⁰其後國民政府同樣是以武力北伐來達成南北基本統一的。張鳴則認為，參與西原借款的曹、陸、章沒有如從前經手借款的梁士詒(1869–1933)、盛宣懷(1844–1916)般拿回扣，大體上是乾淨的，個人品行也的確要好些。⁴¹此亦即段氏所謂「絲毫未肥

³⁶ 許毅、趙雲旗：〈「西原借款」與段祺瑞獨裁賣國〉，載許毅(主編)：《北洋政府外債與封建復辟》(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96。

³⁷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十七下至十八上。

³⁸ 西原龜三：《經濟自治論策》(東京：國策研究會，1926年)，頁4。

³⁹ 唐德剛：《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238。

⁴⁰ 馮學榮：《從共和到內戰：見證北洋十七年》(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頁187。

⁴¹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頁237。

己」。李北濤云：「天真愛國之學生，滿腔熱血，無可發洩，一有刺激，立即爆發。乃有雄桀之徒，乘機利用，移禍江東，令學生集矢於所謂親日派之曹汝霖，舉凡日本二十一條交涉、青島懸案、巴黎和會失敗，無一不歸咎於曹，遂有五四風潮之發生，硬說曹親日賣國，再拉出兩位被稱親日派之章宗祥（時任駐日公使）陸宗輿（時任法制局長）為陪客，以打倒曹、陸、章之口號，遊行狂呼，橫行一切。」⁴²蓋國人自古以來強調志節，流於意氣之爭時，對外強硬者多目為愛國志士，主和者乃斥為賣國。近代國難接踵，這種情況尤為嚴重，形成一種虛矯的愛國主義高調。清末民初，只要與外人交涉而妥協者，多數會被扣上「賣國賊」、「漢奸」之名，曹、陸、章的遭遇不難想像。然而三人實際上是技術官僚，所做的包括引入西原借款的中日交涉，都無非是承襲了晚清外交官一貫的做法，盡可能斟酌字眼，用協議和條文，對強暴的對手加以某種約束，以求減少損失。⁴³段祺瑞面臨政府財政危機，對日本的借款欣然接受，甚至一開始就不打算歸還，而這筆款項最後也終於成為日本政府的壞帳。故段祺瑞晚年作此詩時，始終認為中國占了大便宜。然如寺內正毅所言：「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⁴⁴寺內之言雖不無自我吹噓，然其著眼處顯然並不止於經濟，這與段祺瑞所見大有出入。當然，段氏仍相信自己主政時「持正義」而「一往前如矢」，則未免剛愎自用之譏了。

時局憂感

上目所論〈懷舊〉一詩，詩題雖云回顧往昔，然以不少篇幅描寫大連在日本占據後的發展狀況，而嘆息國人不能以日為師，已可納入時局憂感的範圍。而〈聖賢英雄異同論〉，勸戒各地軍閥棄英雄之殺戮而行聖賢之仁義；〈因雪記〉中念佛、弈棋、觀景的筆墨雖占去全文泰半，實賦予大雪以消災除禍的涵義，寄望上蒼為時局「啟一線之生機」。此外，《正道居集》中尚有不少篇章涉及時局憂感的主題。如其對於國際局勢，不時發表意見。舉例而言，〈砭世詠〉二論述一戰以來的局面道：

歐戰撼全球，大地盡瘡痍。列強相對峙，彼此爭雄雌。
怨讟積愈久，兇惡愈前茲。飛機空中走，爆彈任意搗。
綠氣死光發，大邑盡殭屍。罔論婦與孺，草木也枯萎。
暴力反仁義，胡以立根基？物已先自腐，蟲生更何疑。⁴⁵

⁴² 李北濤：〈段祺瑞及其同時名人〉，載薛大可等（著）、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雄霸一方》（臺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41。

⁴³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頁238。

⁴⁴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1年），下卷，頁137。

⁴⁵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三上至三下。

段祺瑞認為，歐戰的性質就是列強爭霸，反仁義、行暴力，幾無公義可言。加上船堅炮利、科技先進，戰後赤地千里的情形，也就不難想像了。比對〈外感篇〉云：

塞爾維亞導火一綫爆發，致令全球驚撼，動員六十兆，死傷三千萬，亙古所無，創此惡劇。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淒涼悲慘，鬼神涕泣。敗者勿論，即使勝者所得幾何？百不償一，元氣大傷，宜有警惕，以慎將來。然而戰後之約，名為減兵，仍競能是圖，務絕異己。潛艇也，飛機也，綠氣也，死光也。男婦老幼，戰員與否，觸機便發，一鑪可冶。酷烈凶殘，千百倍前。⁴⁶

對於戰勝國怙惡不悛，毫不總結教訓而依舊大力投入軍備競賽，感慨不已。既然講強權而忘公理，那些居中調停的國際和平組織無疑形同虛設：「海牙和會，力理相聞，似難允執厥中，幾同故事。國際聯盟，理勝而力弱，永久和平，仍難作為保障。」⁴⁷海牙會議(Hague Conventions)一稱「世界保和大會」或「萬國和平會議」，由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1872–1918)發起。第一次會議於1899年舉行，參加者有中、俄、英、法、美、日等二十六國；第二次會議於1907年舉行，與會四十四國。兩次會議通過十三個公約、三個宣言，合稱「海牙公約」。實際上，列強披著和平外衣，只是麻痹敵方，假裁軍、真備戰。至於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凡爾賽條約》簽訂後組成，高峰期擁五十八個會員國。然而國聯缺乏軍隊，無力執行決議，最終難以調解國際糾紛，無法阻止法西斯侵略及二戰爆發。故段祺瑞稱海牙會議「力理相聞」，國際聯盟「理勝而力弱」，可謂一語中的。

至於有關國內時局的憂感，形諸詩文者為數更多。如〈閔世〉篇云：

漸流為政客，侈談無羞恥。更進列黨籍，堅持彼與此。
納污斂羣眾，附勢爭延企。利用為前導，犧牲類糠粃。
伐異幟鮮明，自詡森壁壘。嗟彼風不古，趨下心如水。⁴⁸

民初的議會政治，乃是從西方引入的。此制在英美行之有年，在中國卻是草創。國會議員生活腐化、攻訐不休，成為人們普遍的印象。⁴⁹段祺瑞在詩中指責這些政客廣

⁴⁶ 同上注，文卷，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⁴⁷ 同上注，頁十四下。

⁴⁸ 同上注，詩卷，頁十七上。

⁴⁹ 正如唐德剛所言：「『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躡等施行的體制，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諮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旦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閒政客。」見唐德剛：《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頁155–56。

納黨羽、趨炎附勢、黨同伐異，不為無因。夏如秋認為，段祺瑞雖有「三造共和」之美譽，而無「共和」之思想。張勳復辟失敗後，段氏再起，卻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這是他最大的失誤。⁵⁰此言雖然，但如張鳴論黎段府院之爭云：段祺瑞雖是武人，但當時對西方代議制的迷信，卻是一種大趨勢，段祺瑞也不能例外，也幻想著可以通過這種制度的正經運作，獲得成效，改變中國的面貌。但真的操作起來，段祺瑞發現事情完全變了味。大家對權力紛爭有興致，但於制度建設卻無心情。自從前國民黨系統的議員領袖孫洪伊(1872–1936)入閣，做了內務部長，並與徐樹錚、段祺瑞發生激烈權力鬥爭後，段祺瑞跟國會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⁵¹故論者批評他「繼承了袁世凱的衣鉢，繼續推行專制獨裁統治」云云，⁵²立論不免偏頗。近來有學者指出，第二屆民國國會(安福國會)一直被認為是段祺瑞的御用政客團體「安福俱樂部」一手包辦製造而成，有不少污點，但其立法運作過程，可圈可點處如行政監督權的實施、文官制度的立法等，還是不少。⁵³

其實段祺瑞對於政黨政治雖有接觸，卻並不可能徹底了解。其〈內感篇〉云：

但名之以黨，能無偏乎？然世界所尚，未敢擅斷。無奈人欲無盡，我見太深，獨力難支，攫取無據。巧立學說，以資號召，一呼萬應，勢力雄厚，有恃不恐，殺機頓生，驅逐無辜，流血萬千，自殘國力，在所不卹。下而有共產黨、無政府黨，流品龐雜，鳩集尤易，身無長物，因利乘便。假愛國之名以禍國，愛羣之名以害羣。氣燄滔天，大地震撼。謂之民意，人莫我何。⁵⁴

段祺瑞以施政者當有「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的格局，若拘於一黨，則所見必有偏差。可是，傳統中國的言官監察功能，隨著明清以來君權的膨脹，已日益萎縮，幾乎淪為替帝王監管百官的工具。相比之下，西方政壇朝野兩黨相互督促的制度行之有效，可為傳世之法。不過，要讓這種西式的政黨政治令國人「淪肌浹髓」，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段氏身後出現的「黨天下」的情況，卻也不幸真如其所逆料，以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團來掌控政權，與古代帝王的「家天下」庶幾無異。進而言之，即便段氏之皖系，乃至北洋，雖非政黨，卻未嘗不是一個利益集團。如段氏的西原借款受到時人及後世詬病，除因牽涉日本之外，更重要的緣故同樣是被認為黨同伐異。黃征等論云：從名稱看，除少數幾項為軍事借款外，大部分都是以經濟建設的名目出現；但實際上恰恰相反，絕大部分是用作政府和軍事開支的。段祺瑞政府依靠日本「輸血」，才能維持其統治和逐步擴大軍隊，連年不斷地對南方進行戰

⁵⁰ 夏如秋：《皖遊札記：解析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若干事件和人物的真實細節》(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段祺瑞的棋局〉，頁238。

⁵¹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頁60。

⁵² 許毅、趙雲旗：〈「西原借款」與段祺瑞獨裁賣國〉，頁167。

⁵³ 嚴泉：《民國初年的國會政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頁83–105。

⁵⁴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十下至十一上。

爭。⁵⁵這些借款中究竟有多少用於南方戰爭，至今猶有爭議。儘管段祺瑞信奉武力統一，將對南方的戰爭視為正義事業，但旁人看來卻只為了皖系及北洋的私利，這卻也正是其〈閔世〉詩中鞭撻最重者。

段祺瑞也論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其〈觀世篇〉曰：

歐戰勝利者，都若帶箭麋。民命不足惜，暴厲殊堪悲。
悖天好生德，何處立根基。攫拏出常情，人豈弗鑒茲。
隱忍近百年，并未較毫釐。物腐蟲自生，國內若棼絲。
生活日漸高，貧富有等差。學說因風起，傾慕馬克司。
工黨勢力眾，持論恆紛歧。蘇俄劫共產，未免更支離。
泰山與丘垤，自來有高卑。強壓令齊一，怪誕竟如斯。
列邦應付難，心形已俱疲。一般喜新彥，歐風爭欲窺。
寓目皆至寶，無學辨醇疵。糟粕偏滿載，歸來願實施。
一旦政柄握，可以為欲為。⁵⁶

段氏認為左傾思想為國人所喜，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受列強侵凌，割地賠款、民生凋敝所致。國內物價上揚，貧富分化，適逢蘇聯不斷通過「第三國際」向外輸送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者以無產階級代言人自居，自然容易贏得知識份子和貧苦大眾歸心。社會上有不同階層的人本屬自然，一如泰山與丘垤有高卑之差。雖說高岸可以為谷，深谷可以為陵，但這並非朝夕之事。如果強調階級鬥爭，勉強要泯滅高卑之差，唯有去高就卑而已。是故段氏目之為「怪誕」。而國內一般知識份子好新務奇，崇洋以為寶，可是學力不足，不辨精粗，強欲將中國改為共產體制，希圖一旦秉政。對於這種情狀，文化保守主義者段祺瑞深感焦慮不安。此外，鄧演達（1895–1931）、宋慶齡（1893–1981）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組織第三黨，段祺瑞在〈砭世詠〉二也有談及：「國際第三黨，自內持異辭。小康僅有法，一壞若漏卮。」⁵⁷民國十六年蔣介石清共，國共分裂。宋慶齡認為「容共」是孫中山（1866–1925）的既定政策，蔣介石此舉是對孫中山的背叛。另一方面，宋、鄧等人也對中共當時的暴力土改政策有所保留，因此欲於國共之外另組「第三黨」，並希望得到蘇聯共產國際的支援。然而，第三黨提倡「平民革命」，將工人、農民、小商人、青年學生一併歸入「勞動平民階級」，視為「革命群眾」，與共產黨的「工農革命」路線大相逕庭，自然得不到蘇聯的支持。⁵⁸段氏稱之為「國際」第三黨，而所持異辭又「自內」而發，不無春秋

⁵⁵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頁94–95。

⁵⁶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十九下至二十上。

⁵⁷ 同前注，頁三下。

⁵⁸ 樊振：〈宋慶齡鄧演達海外籌組「第三黨」始末〉，《縱橫》2011年第12期，頁16–20；諶旭彬：〈宋慶齡籌組「第三黨」始末〉：<http://view.news.qq.com/a/20131011/000001.htm>（2015年2月17日）。

筆法。在他看來，第三黨招攬城市平民，只有「小康之法」（如周恩來〔1898–1976〕說「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而其理念及行為一若漏卮，無法自圓其說，於事無補。不久，第三黨因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雙重壓力而失敗，自然不待著龜而知了。

正道居詩文的感化主題

所謂感化主題，可分為民生教化及國是建白兩方面，亦即段祺瑞的個人信仰和治國理念之呈現。整體而言，段氏相關思想不出儒釋兼融之道，即信奉以儒治人，以佛治心。五四以來，傳統遭到破壞，新的秩序卻未能馬上建立。段氏竭力倡導回歸傳統道德，未嘗不標誌著中國社會對於當時現狀的一種反應。對於內政與外交，段氏也多所建白，他對於日本的態度尤堪注意。

民生教化

如前文所言，段祺瑞早年在私塾和軍校接受儒家教育，晚年又皈依佛教，故儒釋合一構成了正道居諸集中民生教化思想的主要內容。例如在〈儒釋異同論〉一文中，他先引述世人所言「世間法勤求治道，澤被生民；出世間法四大既假，萬象皆空。儒釋兩教之大別，確鑿可據」。但卻不以為然：

〔兩教〕異途同歸，無非為斯世斯民也。蓋孔子以道德仁義禮為準繩，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依歸，天覆地載，一視同仁，泯其畛域，包羅萬類。世尊以生老病死苦啟悲憫，普渡眾生，佛之宏願，茹苦自修，現身說法。以不種因為真諦，無人無我，免啟紛爭，應觀法界性，勿令心妄造。甘居清寂，涵育大千，名曰出世，無時不心乎世間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固知文明之進步，爭競之風愈烈，所以從先進者，欲復上古敦樸之習，有以抑勒之與！佛悟澈終始，隨緣善化之旨，正復相同。……至於克己復禮，非禮勿言勿聽勿視勿動，作善降祥，作惡降殃，與夫身口意所生，貪嗔癡所戒，皆自治之工夫，更無所謂異同也。⁵⁹

段祺瑞釋《論語》「先進」一節，乃從何晏舊說：「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⁶⁰他認為佛教主張「甘居清寂」，正與孔子「從先進」之意相同。文明進步，社會變化五花八門，導致人心不古，必須以敦樸之道以治之。其次，段氏認為儒釋在善惡觀念上皆強調自治，也無異同可言。兩者略有差異者：

⁵⁹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十九下至二十上、二一上。

⁶⁰ 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96。

惟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僅不聞其聲已耳，仍不免於食。顧天生動物，業由自作，應遭慘劫，理有固然。然恣口腹者，即使適可而止，而物與之說，猶未盡致。其胎卵溼化，賦性本同，在如來視為一體。不殺則滅因，滅因則無果。由惻隱之端，極仁愛於究竟。……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故加之而不怒，所挾持者甚大。彌勒佛偈有云：「人罵就說好，人打自臥倒。他也省力氣，我也少煩惱。」逆來視為前因，自無痕迹之可言，此儒與釋微有不同之處也。⁶¹

宋儒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謂以生民為同胞、萬物為同類，故當汎愛人和世間所有物類。然如《孟子》所言「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卻猶不免於食肉，則儒者「物與」之說，在段祺瑞看來尚乏踐行之實。反而佛教茹素，卻是儒家惻隱仁愛的極致。根據段府老僕王楚卿回憶，段祺瑞拜佛茹素始於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失敗下野；⁶²而段氏幼女段式巽（1901–1993）則說，段祺瑞以為「作為武人，難免打仗死人，應該懺悔罪過」，故通過吃素來為過去在軍旅生涯中殺人的罪孽懺悔，釋冤解結。據說段祺瑞晚年胃部潰瘍出血，醫生家人勸他開葷以加強營養，段祺瑞斷然拒絕道：「人可死，葷絕不能開！」⁶³可見其修行之力。段氏站在佛教立場勸戒世人，主要強調者亦為戒殺。參以其他作品，如〈賦答修慧長老〉：「殺生佛所戒，意味深淵泉。……眾生累世業，大劫成自然。」⁶⁴〈砭世詠〉一云：「天竺大明王，智慧賅六通。……戒殺說因果，玄奧越太空。」⁶⁵〈末世哀〉更針對施政者云：「天有好生德，忍作荊棘場？因果罔或爽，戕人還自戕。殘民逞私意，自然有天殃。」⁶⁶其次，他認為處理旁人的嗔念，儒家只是以忠恕之道來承受化解，而佛教則將這種承受視為對前因的償還，更為徹底。段氏以為儒家只注重現世，而佛教則「大慈大悲，無量無邊，不止娑婆世界已焉」。因此他總結道：「以進為進者，儒學也，立身之具，美善兼備；以退為進者，釋教也，能世人之難能，潛移默化，此儒釋所以異同也。」⁶⁷換言之，段祺瑞以為儒釋二道用世之心一致，差異只是方法與功夫程度的不同而已。

在所謂「世間法」方面，段祺瑞對孔子同樣推崇不已。其〈孔道〉云：「則天惟唐堯，無能名邳隆。孔子集大成，獨肩道在躬。至誠贊化育，大德配蒼穹。萬古生民

⁶¹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二一上至二一下。

⁶² 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頁351。

⁶³ 戴健：〈段祺瑞——皖系北洋軍閥集團的首領〉，載合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阜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皖系北洋人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4–28。

⁶⁴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一下。

⁶⁵ 同上注，頁二下。

⁶⁶ 同上注，頁七上。

⁶⁷ 同上注，文卷，〈儒釋異同論〉，頁二二上至二二下。

類，悉在教化中。孝弟仁之本，綱常澈始終。修齊逮治平，體用悉貫通。至道括瀛寰，小康進大同。」⁶⁸此外，段氏還有兩組詩向世人弘揚傳統道德，以儒家思想為主，佛教為輔。其一為〈十勵篇〉，包括〈勸學〉、〈倫常〉、〈規婦〉、〈存仁〉、〈處世〉、〈交游〉、〈作人〉、〈出仕〉、〈治道〉、〈因果〉；其二為〈八箴〉，包括〈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如〈存仁〉篇云：「求學原為己，但期不違仁。富貴浮雲去，惟有德潤身。陋巷亦可樂，憂道不憂貧。好惡雖異俗，自來各有真。」⁶⁹主要將「四書」成句櫟括為詩，以便世人記誦。

對於道教思想，正道居詩文也有涉及。然其〈儒釋異同論〉云：「道教雖介儒釋之間，似難以峻其極。」⁷⁰意謂道教之理未及儒釋爾。不過有趣的是，段氏仍有〈靈學要誌敘〉、〈靈學特刊序〉二文，揄揚道教。五四運動崇尚科學精神，而靈學的出現乃是對五四精神的反動。所謂靈學，一般包括他心通（心靈感應）、天眼通、招魂術、輪迴、先知先覺、意念致動等內容。民國七年初，上海成立了靈學會，出版《靈學叢志》，設「盛德壇」扶乩，而其倡導者竟是籌建中華書局的俞復（1856–1943）、陸費逵（1886–1941）和翻譯家嚴復（1854–1921）。八年（1919），迮仲良、朱翰墀、朱品三等人在北京成立靈學組織悟善社，建「廣善壇」，以孚佑帝君（即呂祖）為壇主，以「鬼神救國」為宗旨，當年9月發行《靈學要誌》。十三年，悟善社創立救世新教，次年經北洋政府內務部批准，在北京組成總會。此教中心人物是安福系政客江朝宗（1863–1943），策劃及捐助人包括段祺瑞、錢能訓（1869–1924）、陸宗輿、曹汝霖、吳佩孚（1874–1939）、章宗祥等人。⁷¹是故段祺瑞為《靈學要誌》作敘，順理成章。其敘曰：「靈者，神明之謂也。我孚佑帝君悲劫運之浩蕩，立社都門，命名悟善。以神仙之妙用，補人事之不足。書沙驗事，覺世牖民。善者使益向善，惡者懼而知改。」⁷²蓋以世人多僅講求現世利益，不信三世因果；若以鬼神之事導其向善，不敢在現世為非作歹，則道教之功用亦不可沒。然而全篇之中，段氏所論述的基礎仍為儒釋二家，而以《老子》、《太上感應篇》等道書之言加以印證。

至於〈靈學特刊序〉則進一步討論到科學與信仰之間的矛盾：「夫萌芽之科學，以管窺天，誤人實深。長此以往，人類滅絕，所以仙佛本其婆心，不憚塵勞，預言禍福以警俗，使之悟善，格其前非。特惜省之不猛，且少見則多怪耳。」⁷³黃克武指出

⁶⁸ 同上注，詩卷，頁五上。

⁶⁹ 同上注，頁十一上。

⁷⁰ 同上注，文卷，頁十九下。

⁷¹ 酒井忠夫（撰）、青格力（譯）：〈善書的流傳以及新儒教、新道教和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結社）〉，載路遙（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68。

⁷²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十五上。

⁷³ 同上注，頁十八下。

民初盛行的靈學研究，一方面源自西方和日本的心靈研究與中國社會的扶乩傳統，另一方面則因一戰之後中國社會對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感到絕望，企圖闡明精神的價值、啟發道德修養與宗教情懷的思潮有密切關係。⁷⁴達爾文《天演論》的首譯者嚴復提倡靈學，蓋因天演論所帶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未嘗不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依據。而段祺瑞於詩中不時提及西方列強使用高科技武器，導致死傷慘重，⁷⁵故兩度為悟善社刊物欣然命筆作序，良有以也。

段祺瑞還偶將身邊發生的故事寫成散文，藉以勸導世人。如〈產猴記〉曰：

家養兩猴，數年不育。本日產一猴，雌猴乳之，撫之，愛護之，卵翼之，惟恐不至。雄猴凝視環走窠外，至情油然而生。出於天真，不能自休。詰朝告者曰：「兩猴爭覆其子，窠狹猴眾，孺猴殞斃。」兩猴痛甚，仍堅握其屍不失。取而埋之，則相從號咷，終日不食。試還之，堅握焉如故。蠢哉猴也！愛之不以道而殺之，雖愛奚益！⁷⁶

兩猴爭寵其子，反導致幼猴凍死。段祺瑞從這則軼事中，歸結出「愛之不以道而殺之，雖愛奚益」的道理。他又進一步闡發道：

總之父嚴母慈，兄友弟恭，孝悌始於家庭，仁愛推於四遠，內而夫唱婦隨，外而睦婣任卹，誠經世之大法，興家之要素。海枯石爛，此誼未可忘也。但初娶之婦善教之，而難養之性以馴；嬰孩之子善教之，而禮義之方以立。及其長也，勤課問學以立身，督責克己以接物，達己達人，而中正之道於是乎成。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溺愛者恆如是也。縱其情欲，任性而為，迨死到臨頭，不堪救藥，藉使椎心泣血，而亦無可如何耳。何以異於猴之自殺其子者乎？夫復誰尤？⁷⁷

此文先登於《甲寅周刊》，章士釗按語云：「昨歲〔民國十四年〕除夕，執政草此見示，所記事小，充類義大，意莊於昌黎之傳毛穎，詞切於柳州之紀橐駝，其志蓋欲傳示子孫，默持風會，苦心孤誼，盡見於辭。爰揭登焉，藉明世道。今之君子，幸勿囫圇讀之。」⁷⁸雖不無溢美，然段氏創作之本意，亦克進一步說明。在五四運動以後提倡傳統道德，未免貽人以頑固守舊之譏。其所謂「難養之性以馴」，對女性社會角色

⁷⁴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165。

⁷⁵ 如前引〈碣石詠〉二、〈賦答修慧長老〉等篇中皆有相關詩句。

⁷⁶ 段祺瑞：《正道居集》，文卷，頁二二下至二三上。

⁷⁷ 同上注，頁二三下至二四上。

⁷⁸ 段祺瑞：〈產猴記〉，《甲寅周刊》第1卷第31期（1926年），頁1；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6卷，頁144。

仍抱持著過時的認知，更有可能引人非議。不過，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在段氏看來並未在中國產生立竿見影之效。民初的議會政治爭執不休，令他在平定張勳復辟後決定組織「御用國會」；而當時學界對德先生、賽先生的仰慕，在他看來卻往往以破壞、犧牲傳統道德為代價。因此，段祺瑞晚年大力鼓吹傳統道德，希望國人回到儒釋二道的懷抱，就不難理解了。

國是建白

段祺瑞的民生教化思想以儒釋二道為依歸，認為先有此修身齊家的基礎，方可治國。他晚年曾作〈策國篇〉長詩，較全面地談論到自己對國家發展的理念，徐一士稱其「關懷國事之忱，溢於言表」。⁷⁹其詩云：

鄉鎮聚為邑，聯邑以成國。國家幅幘廣，畫省為區域。
民與國一體，忍令自殘賊？利害關國家，胡可安緘默？
果具真知見，興邦言難得。民智苦未齊，胸襟寡翰墨。
發言徒盈庭，轉致生惶惑。政府省長設，各國垂典則。
邑宰如家督，權限賴修飭。統治成一貫，籌策紆奇特。
政不在多言，天健無休息。晚近綱紀隳，高位僉人弋。
武夫競干政，舉國受掎克。擾攘無寧土，自反多愧色。
往事不堪言，掃除勿粉飾。日新循序進，廉恥繼道德。
農時失已久，飢寒兼憂逼。民瘼先所急，務令足衣食。
靖共期力行，百司各循職。良善勤獎誘，去莠懲奸慝。
言出法必隨，不容有窺測。土沃人煙稀，無過於朔北。
曠土五分二，博種資地力。兵民移實邊，十省兩千億。
內地生計裕，邊疆更繁殖。道路廣修築，交通無閉塞。
集我國人資，銀行大組織。獨立官府外，經理總黜陟。
發達新事業，隨時相輔翊。輸入減漏卮，製造精品式。
肥料酌土宜，灌溉通溝洫。比戶餘粟布，孝弟申宜亟。
既富而後教，登峰務造極。國際蒸蒸日上，誰復我挫抑？⁸⁰

這篇長詩對於時局的看法，可歸納為幾點：（一）自由言論：民眾與國一體，若有想法或建議，不應緘默不語，真知灼見自可一言興邦。然而，段氏認為民智不齊，受過教育的國民為數甚多，如果眾聲喧嘩，收效只會適得其反。（二）權集中央：段祺瑞任總理時，主張武力統一全國，功敗垂成。他認為地方官員的職責就像管家，權

⁷⁹ 徐一士：《亦佳廬小品》，頁82。

⁸⁰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四上至五上。

限應該受到中央制約，不能使其割據坐大成為土皇帝。只有在大一統的格局下，政令才可施行無礙。他更坦白承認，近年來小人得志，武夫干政，戰和無常，令全國生靈塗炭，自己與有責焉。回顧往事，於心多愧。(三)富民勸善：連年征戰，導致農時久失，人民衣食堪憂。政府在勸農之餘，還應協助灌溉溝洫。為使百姓生活安穩，更要獎善懲惡，不至為歹徒所威脅壓榨。(四)實邊修路：東北地廣人稀，土壤肥沃。若能移民實邊，不僅可減少內地的競爭，也可令邊疆富庶起來。而配套措施，則以修路通車為首要。(五)發展工商：中國銀行事業不發達，每受外人掌控掣肘。國人若能集資興辦銀行，同時進一步發展工商業，生產優質貨品，則對外貿易逆差可以舒緩。(六)提倡道德：在人民富有之後，政府便應通過教育來提昇全民的知識水平，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根據徐一士所云，此詩作於民國十六年，即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此時段祺瑞已下野居於天津，作為此詩，當有感於北洋政權風雨飄搖，然對中國的未來卻依然滿懷憧憬。

外交方面，段祺瑞在〈十勵篇·治道〉寫道：「孔子大同化，覆載盡包藏。親親而仁民，由邇及遐荒。種族畛域泯，無所爭威強。庶減刀兵劫，救世功無量。」⁸¹段氏雖因西原借款而被視為親日派，但他在袁世凱時代反對簽署「二十一條」，並打算與日本決一死戰；晚年又為避免遭漢奸利用，舉家自天津南遷上海。至於西原借款，惲寶惠(1885–1979)回憶段祺瑞一開始就準備賴帳不還，並向代總統馮國璋直言不諱。⁸²而前引段氏自作〈持正義〉篇，則稱讚借款的寺內內閣「款皆十足交」，「列邦所稀有」，「忠恕固難喻」。段氏之詩固有可能為事後粉飾其說，然其與馮國璋本有瑜亮心結，「賴帳不還」也只怕是信口搪塞之言。筆者以為，段氏並未將寺內內閣與其前任大隈內閣一概相量，簡單地視為「敵國」。在段祺瑞眼中，寺內、西原所奉行的王道政策，一改日本的帝國主義形象，與他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契合。否則，僅因「款皆十足交」便以「忠恕」稱許對方，無乃太過。曹汝霖指有了這筆貸款，「官員無欠

⁸¹ 同上注，頁十二上。

⁸² 王毓超說：「一天，細雨初晴。馮國璋打電話到國務院，約段祺瑞到公府去，有事面談。惲寶惠告訴段時，段說：『好，咱們去，開開櫃子，帶着點錢，大概是馮老四又想贏我幾個。』他認為是馮約他打牌。當惲陪着段到了公府見到馮後，才知不是那麼回事！段剛一坐下，馮就說：『現在在外面都說你竟向日本借債，打內戰搞武力統一，你要慎重啊。』段問：『誰說的？是誰在發這種不利於國家的謬論？』馮說：『你別管是甚麼人說的啦，事情不是明擺着嗎？』段說：『政府經濟拮据，處處需要錢，入不敷出，不借債怎麼辦？打內戰搞統一，誰願意打內戰？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來說吧，是我們要打仗，還是他們要打我們？主持一個國家的人，沒有不想統一的，難道說你當大總統，願意東不聽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對抗嗎？』馮說：『可是債借多了，將來怎麼還哪！打仗又沒有必勝的把握，枉使生靈塗炭，實在叫人痛心！我看還是都慎重點好。』段說：『慎重是對的，可是不能不幹事呀。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他呀，只要咱們國家強起來，到時候一瞪眼全拉倒。』見王毓超：《北洋人士話滄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45。

薪，軍警無欠餉，學校經費月必照發，出使經費月必照匯，即清室優待費用四百萬元從未積欠，至交卸時，庫存尚有三百萬元，此皆財政部有賬可稽」。⁸³解決了政府營運的燃眉之急，再以餘款策劃南征，方才符合輕重緩急。正如張鳴所論，從康有為(1858–1927)到孫中山，都有過出賣領土主權以換得中國改革和強大之資本的設想，段祺瑞如果這樣想也不奇怪。更何況，就當時而言，段祺瑞並沒有意識他的親日會導致主權流失。⁸⁴

段氏還有〈藤村子爵索書口占即贈〉一詩，先錄於《正道居詩》。此藤村氏即藤村義朗(1871–1933)，為日本之實業家、政治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藤村向段祺瑞求書，段氏藉此機會口占一詩，表達了對日外交的看法。詩云：

點者唱黃禍，意在謀分瓜。神皋渡弱水，相望僅一窪。
 種族文化同，由來是一家。兄弟不鬪牆，外侮疇能加？
 我本大農國，願共話桑麻。盈胸互相資，比鄰孰予遮？
 舵工善觀風，轉致路三叉。南針握不移，直指自無差。
 諸君惠然來，意氣薄雲霞。交鄰有大道，此願不厭奢。
 根本誠已固，枝葉自榮華。宣尼大同化，推行極天涯。⁸⁵

中日「同文同種」之說，本為日人所造。甲午戰爭後，日本為了與英、俄等國勢力抗衡，遂製造「同文同種」、「日中一體」的輿論，企圖拉攏中國為其所用。之所以產生這種輿論，靈感來自「滿漢一體」的格套：滿清以完全不同於漢族的文化、文字和生活習俗而入主中原二百餘載，只因旗人主動融入中華文化體系。⁸⁶段祺瑞早年親身經歷甲午戰爭，不可能不了解此說的由來。然而在詩中強調「種族文化同，由來是一家」，則是希望中日能坦誠相處，顧念「兄弟之情」，不復以兵戈禍及兩國百姓。參以段氏作於民國十五年的〈奉贈清浦子爵〉，也有稱許對方「慷慨謀國利，眇摯為睦鄰」、而相聚則「同朋東亞事，肯為道諄諄」等語。⁸⁷可嘆的是，幾年後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段祺瑞風塵僕僕自津赴滬後，書面回答記者道：「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又曰：「日本暴橫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

⁸³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誌社，1966年），頁176。

⁸⁴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頁249。

⁸⁵ 段祺瑞：《正道居集》，詩卷，頁六上。

⁸⁶ 見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增訂本），頁102。

⁸⁷ 段祺瑞：〈奉贈清浦子爵〉，《遼東詩壇》第16期（1926年），頁3。清浦子爵即清浦奎吾（1850–1942），大正十三年（1924）曾任內閣總理大臣。

雖有十日本，何足畏哉？」⁸⁸由是推之，蓋以前與寺內、西原相交則喻之以理，與藤村、清浦等相交更感之以情也。

結語

宋國濤說得好，段祺瑞出身行伍世家，飽嚙世間冷暖。早年身懷救國之志，卻無法施展強國才華；其後受新式軍事教育和有留學歐洲經歷，但思想行為方式卻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甚深。⁸⁹劉春子、殷向飛則云：「以事功論，民國人物與段祺瑞相侔者指不勝屈、而以情操初衷論，則與段祺瑞相提並論者少。遊走於爾虞我詐的政壇，段祺瑞自白固有英雄欺世之語，然而嘗一臠而知鼎味，從段氏片言隻語中，我們可以望見其風骨，也能於其間品鑑民國往事之滋味。」⁹⁰本文在簡介段氏生平、梳理正道居諸集的版本情況後，繼而論析《正道居集》詩文之感世宗旨。感世宗旨可透過「感懷」、「感化」兩個主題來呈現，「感懷」包括歷史感慨及時局憂感兩方面。段氏對古今歷史及國家現狀的評駁與感嘆每每形於筆墨。如〈聖賢英雄異同論〉歷數各代史事，藉以勸戒民初割據軍閥。〈先賢詠〉評述李鴻章的一生事業，〈旅大游〉與〈懷舊〉談到甲午戰後中日國力此消彼長的現實，〈持正義〉甚至以曹汝霖等人與日交涉的往事為主旨。對於西方諸國弱肉強食的行徑，段氏頗有批評。而二〈感〉篇、〈砭世詠〉等對於國內議會政治的混亂、學生運動的紛紜、共產主義的興起，也表達了頗深的憂慮。「感化」則包括民生教化、國是建白兩方面。民生教化方面，〈儒釋異同論〉重申二教殊途同歸，〈孔道〉、〈十勵篇〉等則為儒釋合一之道的引申。段氏對道教的評價雖不及儒釋，但仍肯定其勸善之旨，故有〈靈學要誌敘〉、〈靈學特刊序〉二篇之作。甚至如〈產猴記〉，更以接近寓言的形式揭發「愛之不以道而殺之，雖愛奚益」的道理。國是建白方面，如〈策國篇〉提出對自由言論、權集中央、富民勸善、實邊修路、發展工商、提倡道德等政策的看法。〈藤村子爵索書口占即贈〉等詩則始終不卑不亢地表達出中日睦鄰的外交觀念。誠然，段祺瑞《正道居集》所收詩文乃研究其生平思想以至近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⁸⁸ 《申報》，民國二十二年1月23日。

⁸⁹ 宋國濤：《民國總理檔案》（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頁51。

⁹⁰ 劉春子、殷向飛：《段祺瑞：三造共和的籠中虎》，頁7。

段祺瑞《正道居集》之感世宗旨探論

(提要)

陳煒舜

段祺瑞(1865–1936)為民初政壇著名人物，著有《正道居集》。由於時代及政治原因，段氏著作流傳甚少，世人鮮克窺其全豹。筆者以《正道居集》為中心，探析其詩文之感世宗旨。「感世」一語，來自段氏所作〈內感〉、〈外感〉二篇，其散文初編亦名《正道居感世集》。段氏強調諸集所收作品皆「有關世道人心者」，而筆者進而歸納為「感懷」、「感化」兩層涵義。本文首先梳理正道居諸集的版本情況，再詳細論析其詩文之感世宗旨如何透過「感懷」、「感化」兩種主題而呈現。第三節從歷史感慨、時局憂感兩方面討論正道居詩文的「感懷」主題，第四節從民生教化、國是建白兩方面討論其「感化」主題。筆者以為，《正道居集》諸詩文作為段氏於己於國之獨白，洵乎研究其生平思想，乃至近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關鍵詞： 段祺瑞 《正道居集》 舊體詩文 感世宗旨 近代文學

A Study on the Aim of the Worldly Concerns in *Zhengdaoju ji* of Duan Qirui

(Abstract)

Nicholas L. Chan

Duan Qirui (1865–1936), a famous politicia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e author of *Zhengdaoju ji*. This anthology of selected poems and essays is rarely known and read nowadays, due to time and political factors. With the focus on *Zhengdaoju ji*,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im of worldly concerns in these works. As Duan emphasized that all the poems and essays included were beneficial to the conscience as pertains to the world, we infer that its worldly concerns include two implications: (1) sentiment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2) propositions about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fter examining the editions and contents of Duan's anthology, this article successively examines how the aim of his worldly concerns is presented through the themes of the two aforesaid implications.

Keywords: Duan Qirui *Zhengdaoju ji*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worldly concern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